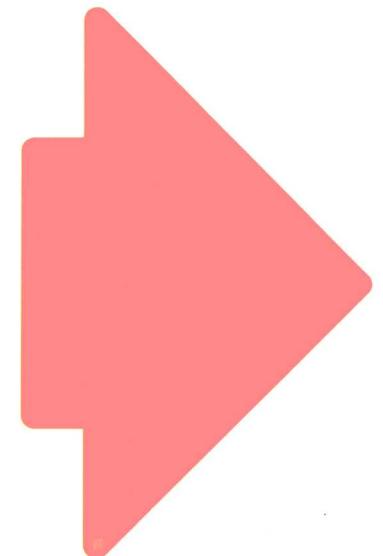


中国领导教育的历史探究

主编 黄书光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领／导／教／育／学／大／系

中国领导教育的历史探究

主编 黄书光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领导教育的历史探究/黄书光主编.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2

(领导教育学大系)

ISBN 978 - 7 - 5617 - 5886 - 1

I. 中… II. 黄… III. 领导人员—教育史—研究—中国
IV. C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1579 号

领导教育学大系

中国领导教育的历史探究

主 编 黄书光
策 划 奚洁人 朱杰人
项目编辑 王 焰 吴海红
文字编辑 李 雯
封面设计 上海成志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销售业务电话 高教分社021-62235021 021-62237614 (传真)
基教分社021-62237610 021-62602316 (传真)
教辅分社021-62221434 021-62860410 (传真)
综合分社021-62238336 021-62237612 (传真)
北京分社021-62235097 021-62237614 (传真)
010-82275258 010-82275049 (传真)

编辑业务电话 021-62572474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浙江省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6 开
印 张 32
字 数 587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8 年 3 月第一次
印 数 4100
书 号 ISBN 978 - 7 - 5617 - 5886 - 1 / G · 3407
定 价 59.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 - 62865537 联系)

《领导教育学大系》总序

领导教育，在中国主要是指干部教育，是领导干部成长进步的重要途径，是培养造就高素质干部队伍的重要保证，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处于战略性、基础性地位。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对领导干部的教育培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随着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深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领导教育事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

新世纪新阶段，我国领导教育正处在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党中央作出的“大规模培训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素质”等干部教育的战略决策以及《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和《2006—2010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的颁行，标志着我们党对干部教育培训的规律性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标志着我党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进入了新的阶段，标志着党的干部教育培训体系的日臻完善。建设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社会，创建学习型组织，人人学习，全员培训，越来越得到各级各类组织的重视，正成为广大领导干部的自觉行动。研究教育培训，加强领导教育理论探索，已成为领导教育发展的迫切需要。

领导教育学作为一门以领导教育为研究对象的独立学科，尚处在初创阶段，无论是与领导学的一些分支学科相比，还是与教育学的相关学科相较，都还略显稚嫩。它的发展，离不开对领导学、教育学学术资源的借鉴，离不开诸如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文化学、哲学等相关学科的滋养，离不开对国外领导教育理论及其先进经验和做法的借鉴吸收，更离不开对中国丰富的领导教育思想与实践经验的总结以及对当前领导教育中重大现实问题的探索研究。理论指导实践，但前提是理论要来源于实践，领导教育学亦是如此。我国历史上宝贵的领导教育经验以及古人对领导教育的精彩论述，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不同时期掀起的教育培训高潮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领导教育的重要指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尤其是十六大以来中央关于干部教育培训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和决策，近年来各地、各系统在

干部教育培训方面所进行的创新探索,等等,都是领导教育学产生的主要土壤,是领导教育学产生与发展的基础和源泉。

循着历史的线索,梳理由古至今领导教育的思想,提炼古往今来领导教育的实践智慧,是领导教育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条件。本套丛书中《中国领导教育的历史探究》、《中国干部教育(1927—1949)》、《中国干部教育(1950—2006)》、《西方领导教育史》、《国外领导教育与培训概览》,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来撰写的。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有其基本概念和范畴,有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命题和原理,有自身的理论体系和问题域,《领导教育概论》承担着领导教育学建构的使命,着力使领导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自立于诸学科之林。领导教育学既需要有哲学层面的思辨,也需要有科学层面的规定和操作层面的要领,由此《领导教育基本方法》、《领导素质测评》以领导教育学中“学”与“技”(区别于哲学层面的“道”)的面貌出现。《领导教育学大系》的这种总体设计,旨在一定程度上能使领导教育学学科框架的总体形态得到初步显现。同时,在编撰中力求使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科与问题相参照,以使之成为丛书的主要特点。

《领导教育学大系》的问世,首先得益于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与华东师范大学共同建设的国内第一个领导教育学博士点。博士点专业建设的要求,博士生以及硕士生培养的需要,催生了领导教育学诸多问题的研究与深入思考。在此对华东师范大学尤其是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表示由衷的感谢!这套丛书的问世,也得益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朱杰人社长、王焰副社长的慨然应允,吴海红编辑的精心加工,使丛书能及时与读者见面,在此深致谢忱!这套丛书是集体合作的产物,各书作者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和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的教师,他们焚膏继晷、条分缕析、剔弊理纷,使领导教育学的多层次多侧面内涵得以清晰显示,深化了我们对领导教育问题的认识,促进了领导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以领导教育为选题,编写系列丛书,在国内尚属首次,国际范围也鲜见同类著作。既属初创,难免粗陋,敬请指正!领导教育学的学科建设还刚刚起步,这套丛书意味着领导教育学研究的开端,离真正确立领导教育学的学科地位还有着不小的距离,我们诚挚地期望广大读者对我们的研究提出宝贵意见,更期待着更多的同行关注、支持领导教育学的研究和发展!

奚洁人

2007年10月

前言

作为现代概念的“领导”(leadership)和领导教育(leadership education)，相对于民众和民众教育，是旨在培养领导者或具领袖气质人才的教育。这种教育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必然要烙上特定时代的印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其干部教育或在职干部教育就是一种较为典型的领导教育。同理，资本主义社会的精英教育，也同样属于领导教育。

回到中国传统世界，中国古代语汇中本没有“领导”这一流行语，与之相对应的是治理国家的各级各类官吏，如王、大王、帝、皇帝、天子、君、国君、诸侯、将、相、吏等名称；领导教育的目标，就是如何使人成为一名合格的君主或官员，也包括对当政者，即在职官员的教育。在此意义上，领导教育大致相当于陈东原先生所说的“养士教育”。他说：“汉代已有‘遗子黄金满籯，不如教子一经’之语；宋代而后，社会观念遂成为‘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了。所以我称这一时期（指西汉至清末——引者注）为‘养士教育时期’。……养士教育就是统治阶级的教育。”^①平心而论，这种旨在培养统治者的“养士教育”在先秦已经出现，并被不同程度地实施着，只是到汉武帝“独尊儒术”后，特别是隋唐科举考试兴起后，“养士教育”遂彻底儒学化了，且为官之后还须继续加强自我教育与道德修养。养士教育为底层的无数贫寒好学之士点亮了通向“领导”——未来统治者的希望之火，哪怕这种希望是十分渺茫的。经过相对公平、严格而又充满诡异变数的科举考试，真正脱颖而出的未来“领导”显然少之又少。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的“养士教育”其实是带有教化意味的“养士教育”，绝大多数的士子不得不面对落榜的残酷事实，回归本土本乡从事儒学的思想传播和教化实践，是传统读书人无可奈何的首要人生选择。事实上，传统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即是由“养士”与“教化”两部分构成的，它们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由此推动了中国传统教育，特别是儒学化以后中国传统

^① 陈东原著：《中国教育史·序》，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1936）。

教育的历史嬗变。

这种中国式的“领导教育”——“养士教育”，能否造就出真正的领袖人才——“内圣外王”之才，始终遭到历代有识之士的深切质疑和不断拷问。其中，过于功利化的科举考试和过于程式化的“八股”取士，严重禁锢了人才的正常成长，可谓人所共愤；到了中西交通的近代，更是千夫所指。需要指出的是，教育毕竟是“社会的基础构造”的产物，“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①传统养士教育的加速衰亡与现代领导教育的迅速崛起，都与国门洞开后近代“欧风美雨”的长期浸染密不可分，而决定性因素无疑是近代中国社会的经济异动和封建帝制之最终拔除。中国领导教育的现代转型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既有举步维艰的器物与制度变革，又有不折不挠的观念与心理革命，其中凝聚着包括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在内的无数教育先驱者的智慧探索和不朽业绩。

领导教育学是近年来领导学与教育学联姻的产物，中国领导教育史则是一个有待深入开掘且极富魅力的研究领域。已出版的相关研究著作有：田广清等著《中国领导思想史》（九州出版社 2003 年）、许倬云著《从历史看领导》（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曾宪年著《老子领导思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等；但至今仍缺少一部较为系统的中国领导教育研究著作。经过课题组成员的多年资料爬梳和思想积累，本书尝试以问题与时代相结合的形式，借重多学科交叉互补的思维理路和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中国领导教育的历史发展进行全方位的深入透视，力求揭示中国领导教育的基本形态和本质特征，把握其运行轨迹和发展趋势，以期对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机制提供必要的本土历史经验，并希望对领导教育学和教育史的学科建设有所贡献。全书共分十二章。

第一章，先秦多元的社会政治理想与领导教育方略。先秦是中国领导教育的发轫期。儒家以伦理为中心的政治思想决定了其以道德教育为核心的领导教育的总体特征：在领导理想人格的设计上，突出领导者个人道德修养的核心价值；在教育内容上，重视道德教育和文学教育，强调“六经”是儒家培养从政者的主要教材，“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在教学方法，主张开放的对话式教学。道家的领导教育哲学围绕“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而展开，其对执政者的要求是能够以“道”修身，以“道”治国，具备“慈”、“俭”、“不敢为天下先”等品质；坚持无为而“教”的教育宗旨，在教育的过程中使受教育者的自然素质能够自由地、充分地发展；非常注重受教育

^① 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李大钊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33 页。

者的自我教育。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领导教育思想，具有浓厚的平民主义色彩。墨家提出“尚贤”主张，强调国家必须重视人才的培养和选拔，塑造具备多样化知识与技能的“兼士”作为领导的理想人格形象；主张教育内容一定要广博，主动往教，“强施”于人。法家的领导教育思想带有鲜明的现实主义气息，认为只有能够明法、行法，且对君主绝对忠诚的“智术能法之士”才能担任国家官吏；在官吏的选拔上，主张军功选士原则，按照所取得功绩的大小授予不同的官位；在对官吏的教育上，提出“以更为师，以法为教”的主张。

第二章，“独尊儒术”政策的确立与儒家领导教育理想的制度设计。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治文化政策的确立，直接导致了儒学的意识形态化和官僚的儒家化，儒学对为政者的要求成为朝廷选拔官员的标准，儒家出身的官僚成为国家领导阶层的主体。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以太学为主体，以郡国学和私学为两翼的领导教育制度。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所授内容都是儒家的经书，“学而优则仕”成为士人进入国家领导与管理阶层的现实途径。以官学为核心的领导教育制度在后世的发展中呈现出如下特点：在为国家培养官僚后备军方面所起的作用逐渐增大；在招生上，等级观念逐渐淡薄；在教学内容上，主要是儒家经典，且随着科举制度的兴盛和程朱理学逐渐上升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官学的教学内容渐渐单一化；越到后期，教育受科举制的消极影响也越大。

第三章，才性之辩与领导教育的学理沉思。才性之辩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术思想界争论的主要论题之一，对这一时期的领导教育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儒、玄、名、道等各学派围绕“才”与“性”阐发了各自对人性和人才标准的思考，才性之辩加速了儒学独尊地位的崩解，促成了多元文化格局的形成；它们对于理想的领导——君主、官吏和领导的培养方式亦进行了新的理论建构。其中，很多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如曹操“唯才是举”的人才观，已进入到领导培养的实践层面。多元化的领导教育思想对传统的儒家领导教育范式产生了剧烈的冲击，从而引发了儒家领导教育思想的深刻变化。

第四章，科举制度的兴起及其对中国领导教育发展的制衡。科举制度创立于隋朝，唐朝在科目和考试内容方面得到了实质性发展，宋朝兴盛，明清逐渐衰弱。科举制度所具有的平等精神，促进了整个官僚队伍质量的提高，同时使得国家的领导阶层具有开放性和流动性。在科举制度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其实际运作中的智识主义倾向与其以德取士的价值取向经常发生矛盾。科举制度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官僚群体的思想信仰和知识结构，主要表现为：儒学价值观成为官僚群体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形成了官僚群体独特的士大夫精神；造成官僚群体知识结构上的偏

差。科举制度使官僚的培养和选拔逐渐捆绑在一起，学校的教育内容、教学方法等都深深打上了科举的烙印，官学教育逐渐被纳入为封建官僚政治体系服务的轨道。

第五章，中国传统领导教育的个案考察：帝王教育的历史透视。本章力图从即位之前的皇储教育和登基之后的帝王教育来刻画中国传统社会政治领袖的形成轨迹。皇储教育的途径有皇帝对子女的耳提面授、现身说法、著书立说；保傅和师傅的引导；东宫的濡染与历练；皇子自身的日常修炼。对在位帝王的教育主要是以经筵与日讲的形式展开的，经筵与日讲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同时，出于治理国家的需要，皇帝还需学习必要的政治、经济、历史等文化知识与统治策略，其主要内容不仅包括出众的文治武功以及治国谋略教育，还包括一种严格的道德和人格的自律教育。本章还以明代内阁首辅张居正亲自编撰，供当时年仅十岁的小皇帝明神宗（万历皇帝）阅读的教科书——《帝鉴图说》为例，来管窥中国传统社会帝王教育之秘奥，力图展现一幅生动形象的帝王教育图景。

第六章，传统官吏的考核与基层领导的教育及自我修养。本章旨在探讨官吏从政之后所接受的考核、教育与自我修养。在官民相对隔绝的传统社会，官吏成为联结皇帝和民众的桥梁和枢纽，通过“上情下达”、“下情上闻”的形式传递着皇帝和民众间的信息。对在职官吏进行考核以及进行再教育，以不断提高官吏的整体素质，关系着王朝的统治成败。历代统治者大都十分重视在职官吏的考核奖惩与吏治清明，制定了比较完备的考核奖惩制度。由于中国传统社会没有专门的吏训机构，基层领导的再教育较为薄弱，为了使初入仕的官吏迅速进入角色，也为了使已入仕的官吏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统治阶层和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编撰官箴，通过宣讲圣贤规训和循吏故事等形式来展开官吏的再教育工程。

第七章，“义利之辩”的再兴：事功派、理学派领导教育的理论争锋与学术影响。本章以“义利之辩”为切入口，对宋至明清之际事功派与理学派的领导教育建构进行深层次的理论透视和学术考察。继先秦之后，“义利之辩”之所以在宋代再度掀起滔天波澜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缘由，冗官、冗兵、冗费问题的突显，以及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加剧所带来的王朝统治危机，都深深地笼罩着宋代中央政府和整个社会，迫使有识之士去苦苦地思考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价值导向和治国人才。义利价值观念的不同必然导致人才选拔取向的差异，并进而反射出其领导教育理论旨趣的分歧。出自富国强兵的目的，以范仲淹、李觏、王安石、陈亮、叶适为代表的事功派学者提出了“事功型人才”理想和以实学为旨趣的领导教育主张；与之相反，以二程、朱熹、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理学派教育家则基于封建社会统治长治久安的目的，坚持由内圣而外王的“道德型人才”范式，设计了一整套以理学或心学为核心

的领导教育理论，并长期占据官方统治地位。直至“天崩地解”的明清之际，以李贽、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戴震为代表的早期启蒙思想家开始有意识地复兴事功思想，对程朱、陆王的主流价值观念及其教育理论进行全面反思与批判，提出了别具创新的领导教育见解。虽然这些见解还很难超越传统社会的历史局限，但已隐约窥见近代领导教育的曙光。

第八章，“西学东渐”与中国领导教育传统的近代转轨。近代中国是一个动荡的大变革时代，经历了空前深刻的社会变迁。“欧风美雨”伴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封建大门。“西学东渐”开启了传统中国领导教育走向现代化探索的序幕。从“师夷长技”到“中体西用”再到“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对西学的认识逐步深化，传统的思维框架和方式一再遭遇挑战和被取代，对传统领导教育的认识、批判和改革愈来愈全面和深入。传统领导教育强调的“内圣外王”的人才规格在近代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近代中国人逐步实现了自我更新与改造，开始主动摆脱传统教育的局限。从“明体达用”到“中体西用”，晚清人才价值取向的嬗变和更新，都显示了中国传统领导教育的近代转轨。

第九章，“人尽其才”与中国领导教育思想的深层变革。辛亥革命胜利后，传统价值观赖以寄托的专制政体土崩瓦解，封建领导教育失去了传统权威的整合力量，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和讨伐；中华民国的成立，奠定了领导教育民主化改革的政治基础，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资本主义的空前发展为中国领导教育近代化提供了物质保证，共和政体的成立呼唤民主、科学的政治人才的养成，这些都对领导教育的深层变革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挑战。然而，封建保守势力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封建复古逆流引发了人们对传统教育观念的理性批判，从而掀起了思想解放的狂飙大潮，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后，中西文化产生激烈的碰撞，民主、科学、自由、个性逐渐成为时代潮流，成为中国领导教育走向现代化的本质内涵。

第十章，中国女子领导教育的萌生与发展。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男尊女卑的男权社会，官吏的选拔与培养始终与男人联系在一起，是男人的专利，女人则被排除在外。尤其是隋唐以后科举制度逐渐成为国家文官选拔的主要途径之后，传统教育就变成了主要是为科举制度做准备的应试教育。只有到了近代，伴随着整个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巨大历史变迁，在社会性别制度发生改变的过程中，女性的价值重估和教育问题才开始浮出历史地表，女子领导教育开始萌生并形成了丰富的女子领导教育思想。中国女子领导教育的发展始终是与中国民族国家建设和民族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其教育目的、教育内容以及教育形式也在社会变迁

过程中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并对中国妇女解放事业乃至中国革命的发展都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第十一章，现代文官制度、教育制度的建立与中国领导教育的现代转型。鸦片战争瓦解了在中国流行了数千年的“天下”观念，迫使中国进入基本上是由民族国家组成的充满了竞争的世界格局。来自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开始在晚清社会精英、知识分子中萌芽。这一时期，民族主义迅速崛起，成为有着统一意识形态的政治运动，中国也从而踏上了变革图强与追寻现代性之路。现代性是一个蕴涵着复杂内容的目标指向，它包括政治制度的革新、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强等。其中，政治制度，特别是文官制度的变革改变了传统的人才标准，延续了千年的中国传统领导教育与人才选拔机制已无法满足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求。伴随着传统的文官制度和中国教育制度向现代文官制度和教育制度演进，中国领导教育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从而呈现出不同于传统的新气象。

第十二章，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家的领导教育智慧。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与中国社会相互结合、逐步本土化的时期。作为中国社会多元领导教育观念“纠结”状态下的“一朵奇葩”，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教育观以其“中流击楫”、“揽辔澄清”的理想信念，“高扬革命”、“赞颂斗争”的明快思想，奠定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领导教育的实践根基。以此为据，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不断地探寻领导教育系统的平衡性和高效性，在残酷的革命现实和宏大的革命理想之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共产党人探索到了“通天入地”的领导教育理论及其实践形态，开创了不同类型的干部教育。干部教育的灵活多样的学习内容与形式凸显了蕴含其中的革命功利主义思想和对理想领袖人格的孜孜追求，展露出其与同时代价值观、文化观环环相扣而又别具创新的领导教育智慧。

全书由黄书光主编。他先提出基本的研究思路和大纲构架，在此基础上课题组成员共同商讨修订，分工完稿。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由刘静博士执笔；第三章，由博士生杨娟执笔；第五章、第六章，由王有英博士执笔；第七章，由黄书光教授执笔；第八章、第九章，由张济洲博士执笔；第十章、第十一章，由张素玲副教授执笔；第十二章，由马云博士执笔。最后，由黄书光负责统稿，刘静、马云协助之。

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 黄书光

目 录

前言	1
----------	---

第一章 先秦多元的社会政治理想 与领导教育方略 / 1

 第一节 先秦领导教育思想产生的背景	1
一、政治思想的多元激荡[1] 二、官制的催生[3]	

 第二节 以道德教育为核心的儒家领导教育设计	3
一、仁政与礼治:儒家的政治理想[4] 二、“以德为先”——领导者的理想人格[8]	
三、以道德教育为核心的领导教育内容[16]	
四、在情境与对话中培养领导者——儒家的领导教育方法[23]	

 第三节 道家——“无治主义”的领导教育哲学	31
一、“治大国若烹小鲜”——道家的无为政治与领导策略[32]	
二、“含德之厚,比于赤子”——道家对领导人的期望[36]	
三、领导修养和自我教育方法论[43]	

 第四节 墨家——平民主义的领导教育设想	48
一、“义政”与“圣王”:政治理想与圣王人格[48]	
二、“尚贤”与“兼士”:墨家的人才思想与领导者的理想人格[54]	
三、“博教”与“强教”:领导教育的内容与教育策略[60]	

 第五节 法家的领导教育思想与实践	64
一、以法治为中心的政治理想与治国方略[64] 二、领导人才的培养与选拔[68]	

第二章 “独尊儒术”政策的确立与儒家领导教育的制度设计 / 78

第一节 儒家思想的制度化与汉代官僚的儒家化	78
一、“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确立与官学的兴起[78]	
二、汉代官僚的儒家化：领导阶层的结构变迁[82]	
第二节 以太学为中心的领导教育体系的初步形成	85
一、“兴太学以养士”——汉代太学的建立[86]	二、道德与治术：太学的教育内容[89]
三、太学的领导选拔功能[91]	
第三节 汉代领导教育制度的两翼：郡国学与私学	92
一、郡县学的初建与地方官员的培养[93]	
二、走入民间的领导培养机构——“精舍”[95]	
三、从汉代循吏群体形象看汉代领导教育的理想人格[98]	
第四节 领导教育制度在后世的演变与异化	101
一、隋唐：“多元化”的理想[101]	二、宋代：对社会下层的鼓励[102]
三、明清：程朱理学的全面渗透与学校独立性的丧失[105]	

第三章 才性之辩与领导教育的学理沉思 / 110

第一节 “才性之辩”与名法派的领导教育观	110
一、“才性之辩”的历史考察[110]	二、“唯才是举”与曹操的领导教育观[114]
三、《人物志》与刘劭的领导教育思想[117]	
第二节 圣人人格与玄学领导教育目标的设计	121
一、自然人性论与理想人格设计[121]	二、对传统儒家领导教育的批判[123]
三、“有情无累，精神自由”的领导教育目标[124]	
四、“尊重才性，顺任自然”的教育模式[127]	
第三节 儒玄兼综与儒家领导教育的嬗变	129
一、太子和皇子教育[130]	二、士族高门的领导教育观[134]
三、傅玄的领导教育论[138]	

第四章 科举制度的兴起及其对中国领导 教育发展的制衡 / 145

 第一节 科举制度的兴起与发展	145
一、科举制度以前的选举制度[145] 二、科举选官：兴起与发展[148]	
 第二节 科举制度对领导阶层与领导者人格的影响	157
一、科举制度的平等精神与领导阶层的流动性[158] 二、从科举考试内容看文官的选拔标准及其对官僚群体人格的影响[163]	
 第三节 取士与选士：领导者选拔与培养的关系	170
一、唐代：科举制度引发的教育危机[170] 二、宋代：科举社会中的学校教育[173] 三、明清：学校成为科举的附庸[176]	

第五章 中国传统领导教育的个案考察： 帝王教育的历史透视 / 179

 第一节 未来帝王的雕塑：皇储教育	180
一、皇帝对皇子的叮咛[180] 二、保傅与师傅的引导[185] 三、东宫的濡染与历练[190] 四、皇子自身的日常修炼[194]	
 第二节 在位皇帝的教育与自我教育	197
一、经筵日讲[197] 二、勤勉读书[199] 三、道德自律[202]	
 第三节 从《帝鉴图说》管窥帝王教育	204
一、《帝鉴图说》编纂的时代背景[204] 二、培养君德与倡导圣学[205] 三、帝王故事中的规训[208]	

第六章 传统官吏的考核与基层领导的 教育及自我修养 / 213

 第一节 传统官吏的考课与奖惩	213
一、传统官吏的考课[214] 二、传统官吏的奖惩[221]	

第二节 基层领导的教育及自我修养 224

- 一、“学”与“仕”之间的脱节[225]
- 二、在实践中提高：基层领导的再教育[227]
- 三、基层领导的自我修养[230]

第三节 官箴——官吏从政为官的教科书 235

- 一、官箴与官吏的培养[235]
- 二、良好职业道德的形成[238]
- 三、和谐领导关系的构建[239]
- 四、在从政实践中养成官德[242]

第七章 “义利之辩”的再兴：事功派、理学派 领导教育的理论争锋与学术影响 / 244

第一节 宋代“三冗”问题的突显与“义利之辩”的再兴 244

- 一、科举名额扩大、恩荫特权实施与宋代“三冗”问题的突显[245]
- 二、王朝统治危机的加剧与“义利之辩”的再兴[246]

第二节 事功型人才与宋代事功派的领导教育探索 247

- 一、“只取不养”的失误与范仲淹对养士问题的求索[247]
- 二、“人非利不生”与李觏注重“效实”的人才教育观[249]
- 三、“以义理天下之财”与王安石的领导教育建树[253]
- 四、义利、王霸之辩与陈亮、叶适以实学为旨趣的“成人”观[259]

第三节 道德型人才观与宋明理学家的领导教育建构 262

- 一、“出义入利，出利入义”与二程以“穷理灭欲”为核心的人格教育论[263]
- 二、义利、王霸、理欲之争与朱熹对“醇儒”境界的追求[265]
- 三、“发明本心”与陆九渊对“学为人”的思考[268]
- 四、“致良知”与王守仁关于“作圣”之路的探索[270]

第四节 “天崩地解”与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家的领导教育创新 272

- 一、“人必有私”与李贽反名教的个性解放思想[273]
- 二、清谈误国的批判与顾炎武对“用世之材”的思考[274]
- 三、“为万民，非为一姓”与黄宗羲对“豪杰”之士的求索[276]
- 四、人性“日生日成”与王夫之关于“可用之士”的反思[280]
- 五、“正其义不谋其利”与颜元“无人才则无政事”的实学型领导教育建构[282]
- 六、“血气心知”与戴震“得养”、“尽材”的人才教育观[283]

第八章 “西学东渐”与中国领导教育 传统的近代转轨 / 286

	第一节 明清之际“西学东渐”与传统领导教育思想的变动	286
	一、西方传教士与明末清初领导教育思想中民主火花的闪现[286]	
	二、封建帝国高层领导人的争论：夷夏之辩[288]	
	三、儒家领导文化与天主教领导文化的对立：礼仪之争[290]	
	第二节 “经世致用”与地主阶级改革派的领导教育思想	292
	一、龚自珍的领导教育观[293] 二、魏源向西方学习的思想[296]	
	第三节 太平天国与传统领导教育思想的变革	299
	一、洪秀全的“天国”理想——传统士大夫教育的背叛[301]	
	二、洪仁玕《资政新篇》中近代人才观的萌芽[303]	
	第四节 “中体西用”与洋务运动领导人才的设计	305
	一、京师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诱发的争论——洋务派与顽固派关于人才素质的交锋[309]	
	二、“远适肄业，集思广益”——留学生的派遣与领导教育传统自我更新[310]	
	三、从“明体达用”到“中体西用”——晚清人才价值取向的嬗变[314]	
	四、“位卑言高”——洋务幕僚及其早期改良派的领导教育新论[315]	

	第五节 “政本艺末”与资产阶级维新派政治人才的构想	319
	一、中西教育文化的融汇和理想新人的期盼[320]	
	二、“政学为主义，艺学为附庸”——维新派政治人才的设计[322]	
	三、“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严复对康梁的政治人才设计的超越[323]	

第九章 “人尽其才”与中国领导教育 思想的深层变革 / 326

	第一节 民族国家的诞生与“人尽其才”的新教育理想	326
	一、民主革命的领导教育思潮与资产阶级革命人才的养成[327]	
	二、“新国家”与资产阶级民主领导教育体制的确立[331]	
	三、民初风云领袖人物的个案研究——孙中山与蔡元培[334]	

第二节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个性独立人格的追求	339
一、“民主”、“科学”赋予现代领导教育观以新的时代内涵[340]	
二、国民性的改造和个性独立人格的追求[345]	
第三节 中西文化的融汇:走向平民的领导教育观	352
一、传统养士教育的近代转型[352]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平民领导教育观[358]

第十章 中国女子领导教育的萌生与发展 / 365

第一节 20世纪之交中国的现代性追寻与女子领导教育的萌生	365
一、社会性别与中国传统的社会性别制度[365]	
二、20世纪初中国社会对现代性的追寻与新女性的出现[368]	
三、女学兴起与女子领导教育的萌生[374]	
第二节 女子领导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377
一、民族主义和社会革命是女子领导教育思想的主题[377]	
二、男女平权的平等思想是女子领导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378]	
三、独立人格是女子领导教育的目的[380]	
第三节 高等教育:女子领导教育的个案考察	383
一、教会女子大学与“女界精英”的教育目的[383]	
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妇女政策与女性领导人才的培育[387]	
三、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思想与延安女子大学的领导教育实践[392]	

第十一章 现代文官制度、教育制度的建立与 中国领导教育的现代转型 / 399

第一节 巨变中的近代中国与传统文官制度和学校系统的裂变	399
一、文官与中国传统的文官制度[399]	二、中国传统文官制度与领导教育的裂变[402]
三、现代领导教育实践的历史意义[407]	
第二节 现代文官制度的初步建立与形成发展	415
一、孙中山的人才观[415]	二、五权宪法的构想[417]
三、文官选拔和考试思想[417]	四、文官制度建设的实践[419]
	五、现代文官制度的形成发展[421]